



改 TO 变 CHANGE 中 CHINA 国

(美) 乔纳森·斯潘塞著 曹德骏等译

三
联
书
店

TO CHANGE CHINA

改变中国

〔美〕 乔纳森·斯潘塞 著

曹德骏 竺一莘 周定国 朱子文译

三 联 书 店

责任编辑: 靳建国

封面设计: 宁成春

Jonathan Spenser

To Change China

Penguin Books

改变中国

GAIBIAN ZHONGGUO

[美] 乔纳森·斯潘塞著

曹德骏、竺一莘、周定国、朱子文译

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新华书店经销

济南 7213 工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9.5 印张 180 千字

1990 年 11 月第 1 版 1990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0,000

ISBN7-108-00392-9

K·51 定价: 4.80 元

内 容 提 要

从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教育制度和生活方式，甚至从人种和灵魂等各个方面彻底的改变中国！

这是一个令人胆战心惊的口号，潜藏着发了霉的阴谋：一个国家试图统治另一个国家，一种主义试图征服另一种主义，未来是光明还是黑暗？

这是一段惨不忍睹的过程，流着黑色的血，横七竖八地躺着残破的躯体。在宗教与科学、文明与愚昧的缝隙中，他们利用各种手段打入中国上层，改变中国的教育制度；派顾问和专家对中国的最高领导层施加影响，并进行经济封锁和文化上的渗透。

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乔纳森·斯潘塞以恢宏的笔触详述了西方各国争相改变中国的史实。情节惊心动魄，材料翔实可靠，多为首次披露或鲜为人知的秘闻。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人不要上帝.....	(1)
第二章	医学救人,救不了民族的灵魂.....	(33)
第三章	用武力闯开中国大门	(54)
第四章	打入中国上层	(91)
第五章	改变中国的教育制度.....	(128)
第六章	被砍头的美国人和“耶鲁中国计划”.....	(160)
第七章	对中国最高当局产生过影响的人.....	(183)
第八章	用科学改变中国.....	(203)
第九章	美国人的雄心.....	(225)
第十章	美、苏在中国	(282)
第十一章	结论.....	(291)

第一章

中国人不要上帝

1644年6月29日，寓居北京城的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正式表奏中国皇帝：“臣启奏陛下，”汤若望写道，“以西方历法预推之日月交食，将于西历1644年9月1日显现。日食既现，则亏圆之数可分。京城及其它省域仰而观之，可见太阳复原。日食亏圆之时各地有异，早迟不一。臣今呈预测日食之详情，奏请御览，乞敕礼部公开占验，庶几新法之密可定。”汤若望还主动提出修复前一年5月宫中大火焚毁的观天仪器。皇帝诏谕汤若望9月初报上测试结果并制修仪器。

中国官员在报告中详尽描述了那年九月的冲突戏剧。中国官员上疏道：“1644年9月1日，大学士范谦率西洋人汤若望，置望远镜等观天仪器于观象台，会历局、钦天监官员及天文生等修葺观象台，以备观测日食。西洋新法所

测之日食，其相交、食既、交后、亏圆、地点诸项，均推算准确。而以中国历法预测之日食，有时间及分数之误。”汤若望的成功得到承认，他被擢升为钦天监监正。这一职位为五品，在中国官僚的九品制梯队中，恰好属于中段。汤若望征求了耶稣会上司的意见，接受了这一职务。上帝的仆人变成了中国的士大夫。

这次任命的意义非同寻常。因为当时两股历史潮流砰然相撞，其深邃含义，恰好构成我们故事的主题。在此之前，中国因自身的先进性而自豪，决没想到西方还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东西。中华帝国无可争议地为万邦之首，中国皇帝膺天宿命，“是上界和人间的中介，居于金銮宝殿之上，高不可及，尊贵无比。”这个国家的无数先贤圣哲，给后代留下了无穷的智慧和智慧。凭着一个小小的、然而神通广大的官僚体制，便统治了1亿5千万臣民。她有着极其完美和成就辉煌的文学、艺术传统，探赜索隐，使海洋、大地，乃至上天的诸多奥秘真相大白。既然如此，还需什么别的新技术？内战、饥馑，甚至外族——例如蒙古人或满族人——入侵，到头来都无关宏旨，固有的秩序总会恢复，征服者无一不被中国文化的文明力量所同化。对中国人而言，他们的国度是“中央之国”，他们的领土内“礼乐教化，尧天舜日”。领土之外则为“蛮夷之邦，不识礼义”。

汤若望的到来是不祥之兆。若说中国人在当时便认清了这点是虚妄之谈，但这个含义还是在两百年后表露无遗。汤若望是在欧洲信仰、知识和科学技术革命风云激荡的岁

月，踏入中国国门的。宗教改革摧毁了罗马天主教的一统天下，哥白尼和伽利略对天体的认识，哥伦布发现美洲，麦哲伦环球探险，改变了人类旧有的地球观念，也确定了地球在整个宇宙中的位置。从 17 世纪起，中国人对地球的认识，便不断受到质疑，此时的欧洲人已不再象其“蛮夷”祖先，任由中国驯化，吸取中国人的价值观。相反，他们的目标是改变中国，使之成为欧洲人能接受的国家，让中国人分享欧洲人的价值观。

汤若望被任命为中国官员，便具有这一层意义。在中国当官决非他的全部目的，而是达到更大目的的手段。他企图将中国人转化为罗马天主教的信徒。汤若望在其耶稣会上司的鼓励下，以其学术之长，一跃变成中国人的顾问，接着跻身中国士大夫之列。他的观点是，科学只能服务于上帝增添光彩之鸽的。而中国人启用汤若望，全因他们觉得，此人是一个对他们有用的技术人才，如此而已。十分明显，总有一方的愿望不会实现。

汤若望能住进北京，尤其是他能施展独特的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的耶稣会先驱利玛窦。利玛窦于 16 世纪末来到中国，他花了好几年时间致力于在中国的贫苦人民中发展教徒，结果收效甚微。他最终明白，争取中国士大夫或朝臣的支持，才是现实的道路。换句话说，他决定自上而下地开展传教。他开始努力学习古汉语，以便能用中文与中国的学者交流，显示他的数学、天文学、制图学以及机械学诸方面的造诣。正如他希望的那样，他的技艺

唤起了中国人的好奇，有的好奇者当上了他的后台，他们代表他行使影响力。1601年，利玛窦获得居住北京的殊荣。利玛窦与中国的学者讨论天主教教义，暗示它与孔子的儒家学说宗旨相同。由于他的博学和诚实，终于使一些中国高级官员皈依基督，皇帝恩准他介绍更多的传教士进入中国。

利玛窦是1610年去世的。他在中国写的日记被金尼阁神父带回欧洲，很快用拉丁文、法文、西班牙文、德文和意大利文出版。在此之前也曾有一些介绍中国的书籍问世——孟多拉根据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见闻而著的《历史》一书，即为一例。不过，以翔实的材料，理性的笔调介绍地球另一面的那个文明的成就，利玛窦乃为始作俑者。从他的书中，读者不光知道这个中国与马可·波罗笔下的那个中国一模一样，而且还知道这个异国领土的生活情景丰富多彩。人们用象牙筷子夹食进餐，喝茶叶汁水，穿缀有花朵的缎面鞋，在最冷的时节士大夫也纸扇不离手。此外，读者还看到了作者对这个文明国家的分析，尽管这个国家力量强大，但对来自西方的影响异常敏感。“我便持这个观点，”利玛窦写道，“中国人的喜好表现十分坦率单纯，一旦他们知道‘洋货’原来有这么好的质量，他们就情不自禁地喜欢它。他们目前的骄傲，在于他们只知周围有一群未曾开化的‘蛮夷’，他们还不了解世界原来还存在着更高级的‘奇技淫巧’！”

利玛窦所称的“洋货”，指的是钟表、地图、钢琴这一

类玩意儿。利玛窦将其送给了朝廷。“洋货”实际上是基督教精神的化身，但试图以此说服中国人，外国的宗教竟有如此先进，仍是难事一桩。利玛窦描述了他们这些耶稣会传教士的微妙处境：

为防止新宗教引起中国人疑心，神父们在公开场合对宗教事务缄口不言。除了向中国朝廷表示敬仰和谨慎地接待来访者，他们把剩下的时间都用于学习汉语、书法和了解中国的习俗。他们努力以身教感化异教国民，就是说，他们是用自己的榜样力量和生活的圣洁赢得人心。这样，他们获得了人们的友情，他们坚持不懈地，一点一点地让中国人接受靠语言所不能说服的东西，并且避免危及他们目前已获得的成功。

当时的欧洲人大都习惯听取宗教法庭和反宗教改革的严厉言辞，上述话肯定令他们大吃一惊。虽然如此，仍有不少人兴趣盎然。

汤若望便对此深以为然。汤若望出身于德国科隆的一家富有的贵族家庭。1611年他刚19岁，便成为耶稣会牧师。当他在罗马学习期间，适逢金尼阁前来传教。两人会面，汤若望对利玛窦遗著中传达的信息深信不疑，认清了自己的真正职业。他申请去远东为上帝效劳，得到批准。修道院院长在1616年的名单上，在汤若望的名字旁边，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可去中国。”金尼阁也为汤若望的才干和热情所感动，请求允许汤若望陪伴他作一次全欧布道收徒旅行，未得批准。修道院院长认为，汤若望抓紧时间完成

学业乃当务之急。1617年，汤若望离罗马赴里斯本，去中国的船队在那儿停泊上货。

汤若望在里斯本与选派去中国的21名耶稣会士会合。这艘船还载有另外的614名乘客，上万只牲畜。1618年4月，轮船起锚。尽管他们象罐头鲑鱼一样挤在“货物、行李和粮食中间”，但船一驶入公海，训练便开始了。根据金尼阁的指示，他们在星期二和星期四学数字，星期三和星期六学汉语。汤若望还加入了学天文的那个小组，因为修道院长采纳了利玛窦以前提出的建议；利玛窦说，倘若耶稣会传教士掌握了修订中国历法的必要知识，“就会提高我们的知名度，使我们更容易进入中国，保证我们的安全和自由”。

1618年10月4日，汤若望一行驶抵西印度海港果阿，五个半月的航行损失惨重。45名乘客死于热病，其中有5名传教士。到了果阿，又有2名修士因身体衰弱不治身亡。就在此地，死里逃生的乘客们第一次听说，早在1616年，中国明朝政府逮捕了早先进入中国的传教士，将他们永远驱逐出境。传教士在南京的教堂和住宅被夷为平地，基督教被视为异端遭禁。幸运的是这一命令并未贯彻到底，好几个传教士还滞留中国，由他们的皈依者掩护在家。北京和其它地方都有这种事情发生。

汤若望等人毅然决定继续前进。1619年7月15日，他们来到葡属澳门。到了澳门，汤若望再次投身学习汉语。他的辅导教师，便是被中国赶出来的范礼安神父。1622年6

月，当荷兰人进攻葡萄牙租界时，汤若望还呆在澳门。这次进攻被击退，部分功劳归于耶稣会传教士们寓所中架设的大炮的准确轰击。就在那年深秋的某一天，汤若望与另外3名传教士偷偷溜进中国北上。汤若望将随行者扔在杭州，找到了一直躲藏在中国的龙华民神父。1623年1月25日，两人结伴抵达北京。他们在京西南城门找了一间小屋栖身，此屋曾是利玛窦的住所。

汤若望是这样描述当时情形的：“我那时年纪尚轻。我陪着年迈的龙华民神父进入北京。他和另一位神父向中国皇帝呈上奏章，请求允准他们在京城研究铜炮。”汤若望补充道，从技术上讲，神父们仍处于被驱逐的境地，当然不可能立即得到答复。但他们借口等待圣旨，便赖在北京不走。实际上，在这个奇怪的举动后面，却隐藏着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政治舞台上正经历一个重要变化，它将间接给传教士带来好处。力主发动1616年驱逐运动的士大夫沈惟宪失宠；1621年，长城以北的满族部落接连几次打败明朝军队。这就使得一些有影响的中国朝臣，有机会向准备作战的皇帝进言，阐述利用西方技术的好处。这批官员中，就有皈依基督教的徐光启和李之藻。他们建议从澳门运来大炮，用它们在北边攻打满族人。他们还提议请传教士作顾问。大炮倒是运来了，不幸得很，有两门炮在试验时发生爆炸，炸死了几名围观者。沈惟利用这一事件再度攻击基督教徒，但未达到将他们驱逐出境，或不准他们在其它省份布道的目的。

正当明廷为自己的生存在边境苦战之时，宫廷内的一个大太监，率领阉党与朝臣中的改革派，展开了残酷的权力争夺。汤若望吸取利玛窦的教训，一门心思地搞天文研究。在中国，天文与历法具有极强的政治——宗教色彩，由于中国皇帝被视为天地之中介，以他的名义颁行天下的年历，将由中国及其属国严格执行。在辽阔的中华帝国国土上，春耕秋收，红白喜事，政治决定，司法审判，几乎所有生活层面都须与阴历和北京记载的黄道吉日的要求相适应。历象推算之误非同小可，在皇朝危机之秋，甚至会导致皇帝本身是否有权充任“天子”的质疑。如果某个耶稣会传教士能检查出中国历象之误，他将倍受宠爱。为使不了解这个背景的欧洲人不再指责他们为何花那么多的时间进行历象推算，汤若望复信道：“传教士们把大量精力用于改革历象并不奇怪，因为如不完成这件纯科学的当务之急，则传教士们将无地自容。”他的意思是，传教士把全部精力放在天文研究上看似令人不解，实则是他们让中国人信奉上帝的唯一途径。只有当传教士显示出学术专长，才有指望进入中国官场，才能获得中国学者的友谊，从而使他们有机会进行大规模的异教皈依工作。

汤若望因成功地预测了1623年10月8日的日食，而名声鹊起，更因1925年9月的日食预测名震朝野。他为此完成了第一部用中文写的天文历书。为了消除别人的怀疑，他写道：“这不过是有关日食的一篇小小的论文，我将其分为两个部分，意在使自己在京城居留期间，能学会中国的

作文法。”1626年，他用汉语完成了论述望远镜的论文，强调了这个仪器对天文研究的作用，同时还指出，这个仪器也具有军事用途。

汤若望以其渊博学识，成功地与北京官场要人建立了紧密联系。然而1627年，他的耶稣会上司，还是把他派到中国西北的陕西。此时，汤若望已经比较习惯在北京做天文研究工作，一到陕西，他便意识到要在充满敌意的京城以外的人民中发展教徒困难重重。或许他的上司认为，让这个年轻人离开城市，放弃科学工作，而去野外接受锻炼大有好处。龙华民神父在给罗马传教团首脑的秘密报告中评价汤若望道：“此人才华出众，判断力强，但不是太谨慎。经验有限。文字工作进步极快。脾气尚可，自信、愉快。尚未完全成熟。他懂得如何与人民打交道，不过提拔他当院长还为时过早。”

虽然汤若望经验不足，但仍以其惯有的充沛精力诱导点化。及至1629年，他已与不少当地官员结成朋友，给为数众多的皈依者施行洗礼。他还顺利地在全省西安修建了一座教堂，房顶高耸一付金光闪闪的十字架。然而汤若望却无法继续沿这条成功之路走下去。1630年，他忽然被召回北京。

在他离开北京的那些日子，基督教徒、耶稣会的热情支持者徐光启被任命为礼部侍郎，这一职位已接近朝廷大臣的最高官衔。1929年，他成功地证明西洋历法比中国历法和朝廷沿用的“回回历”更精密。皇上敕谕徐光启主持

新设立的历局，挑选他喜欢的职员。他启用了他的朋友、同是基督教徒的李之藻，还任命了两个耶稣会传教士龙华民和邓玉函。耶稣教教士们翘首以盼进入中国官场的机会终于来临。邓玉函曾与伽利略一道，同在塞西学院做院士。1616年，教皇下诏禁止他为哥白尼的日心说辩护，因伽利略曾拒绝给耶稣教预测日食。邓玉函对教皇大为不满。他还与当时欧洲的另一位伟大的天文学家开普勒（德国人），保持着频繁的通信联系。他显然有资格综合已有的知识，领导耶稣会传教士把持中国的学术机构。

邓玉函在1630年猝死，耶稣会教士们大功告成的希望，化为泡影。尽管汤若望在数学上的造诣远不及邓玉函，但他的天文学知识，大大超过了那些信奉中国历法和“回回历”的反对派。他手中掌握着最新技术，即欧洲科学革命的成果：它们是日食预测新法；天体运动的几何分析；球面地球以及用经纬线划分地球表面的概念；高级代数；还包括能增强精确度的望远镜以及测微计等等。这样，尽管教会严禁耶稣会教士将日心说理论引进中国，但他们在技术上已经领先于中国人。

汤若望接过邓玉函丢下的工作，开始检测中国的天文历书。他发现了不少疏漏之处：在中国的星历表（他们笼统称之为历书）中；他写道，“我们发现每一天的旁边，都注有一个替换日，我们对此不感兴趣。在用于揭示天体运动的另外一部历书中，我们立即注意到许多因演算不精而带来的失误。”汤若望自告奋勇，要为朝廷献上一部“完备

之历书”。他为之花费了5年心血，方才告臻。这部著作分三个部分，分别为天体理论论述、恒星解析和计算表格。不幸的是，他的上司和保护者徐光启于1633年逝世。光禄卿李天经走马上任。汤若望历来不许人犯错误，他对李天经的领导深感不安。“李天经是个好人，”汤若望在一篇文笔简洁的笔记中写道，“可是太爱当好好先生，在应该斗争的地方往往不战而降。”这些“地方”指的是历法计算和天体观测，在李天经的指导下，历局各派时常争吵不休，汤若望不得不经常为捍卫自己的预测方法的正确性而卷入其间，还必须保持独立。“因为我清楚地知道，只要中国数学家加入了我的计划，那么全部计划反倒会功败垂成。”此外，他还须寻找时间处理水力和光学方面的难题，甚至去修理利玛窦很久以前送给万历皇帝的钢琴。为使钢琴能奏出悦耳动听的音乐，他还用中文撰写了一部钢琴演奏法。

汤若望利用进宫修钢琴的机会，赠送了两件礼品给皇上。这两件礼物是1618年从欧洲携来的，一直找不到机会上贡。一件礼物是有关耶稣基督的画册，画在上等羊皮纸上，图案和笔法堪称精美。他在画卷上留下了中文题跋。另一件礼物是向初生基督朝圣的东方三大博士的彩色蜡像。皇上接受了礼品，据说“深得帝眷”，珍爱无比。汤若望过去从未亲睹龙颜——只是1644年他被封为中国官员时，才有幸了却夙愿。当然，在就历书形式而举行的若干次廷议中，他遇见了一些太监，并把他们发展成了基督教徒。在汤若望的吩咐下，这些太监将有关基督教的信息带入皇帝

的后宫禁苑。后宫禁苑居住着皇帝娘娘和嫔妃，只有皇帝和阉人太监才可入内。虽然禁苑中的女人们无缘聆听新近信奉上帝的太监们讲授高深的基督教教义，但她们事实上已皈依基督，汤若望对自己的迂回战术深感满意，因为他无法探知哪位娘娘最受皇帝宠幸，不知谁会给皇帝施加影响。他向极可能信疑参半的欧洲听众指出，上帝的优雅鲜明地体现在这种交易里：凡受过洗礼的中国皇妃，容颜越发动人，从此倍受恩泽，而讥讽上帝的女人则会变得丑陋不堪，马上失宠。

汤若望的位置从此难以界明。他自信技术比中国学者略高一筹，但又必须随时证明这一点。他坚信自己信奉的宗教包含真理，但也清楚中国人从内心深处觉得，他们的文明远比西方文明更先进。他希望能劝诫皇帝信奉基督教，然而皇帝却不愿屈尊与之见面。他只好求助于太监，让他们充任精神媒介，对他们取得的任何微小成就都夸大其辞地渲染褒扬。有的时候，生气勃勃的传教士还被中国人当作匠人与听差，中国人特别精于此道。汤若望急于想把中国的士大夫发展成基督徒，然而他们却聪明地利用了他的日益膨胀的但并无力量的影响。

汤若望从利玛窦的书中得知，中国的士大夫官绅们，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对自己的“玄虚”颇为自得。他本人的经历也证实了一点。在野蛮的拉丁美洲或东南亚地区行之有效的那一套招徒方法，在中国断断行不通。因此，尽管汤若望是个急性子，仍为两位方济各会行乞修道